

全球史译丛  
QUANQIUSHI YICONG

#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美〕罗伯特·B. 马克斯 著

## 内容简介

本书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世界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地区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而不是在欧洲。现代世界的特征是工业、民族国家、国家间的战争、世界上最富裕与最贫穷地区间巨大而不断增长的差距、“旧生态体制”的摆脱。要从根本上解答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是如何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更多地应该是沿着以下的思路：便利的煤炭储藏使英国首先工业化，然后把这种早期工业化的成果运用于武器装备，最终用这种新式武器对付亚洲人和非洲人……

网址：www.ep.com.cn

ISBN 7-100-04826-5



9 787100 048262 >

ISBN 7-100-04826-5/K·897

定价：16.00 元

全球史译丛  
QUANQIUSHI YICONG

#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美〕罗伯特·B. 马克斯 著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C211114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1  
8355:2

全球史译丛

#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述说



[美] 罗伯特·B. 马克斯 著  
夏继果 译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C211114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 80 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 年 5 月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序 言	1
导 论 西方的兴起？	5
第一章 1400 年前后的物质世界和贸易世界	31
第二章 从中国开始	61
第三章 帝国、国家和新大陆，1500—1775 年	93
第四章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1750—1850 年	131
第五章 差距	167
结 论 改变还是延续？	207
索 引	219



## 第一章 1400年前后的物质世界 和贸易世界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既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也不是我<sup>21</sup>们自己创造的。事实上，我们面对的世界由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结构组成。这些大的结构变化十分缓慢，其变化极少是哪一个人有意所为的结果，在大多情况下纯粹是一些宏大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不易觉察，由大规模的、持久的社会运动所导致，或发生在历史的偶合出现的时候。

为了理解伴随现代世界起源的一系列巨变，我们有必要从1400年人类生息于其中的世界结构开始。当然，我们不可能考察那时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有相当的选择性（尤其是为了信守诺言，使这本历史书“简明”）。我这里选择强调的是1400年世界的两个主要的结构层面。首先是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自然环境，那是一个绝对的农业世界，或者可以称之为“旧生态体制”；其次是把旧大陆大多数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网络。这样，本章要介绍两类世界，其一是物质世界，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受到相当的局限，其二是贸易或商业世界，它把世界的部分地

区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说明这两个世界的相互联系,本章最后考察 14 世纪中期流行于西欧和东亚的黑死病的原因和影响,那是降临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之一。

22 本章还要介绍一些关键性概念,它们将在全书使用。本章大多内容集中于物质世界,特别是人口的规模和大多数人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本章要介绍的概念包括文明的兴起和农业革命,市镇或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统治集团与农民(peasants 或 agriculturalists, villagers)的关系、文明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总起来构成旧生态体制,它的运行在 14 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中得到检验。

我们还要考察 1400 年左右所存在的世界体系。今天,关于全球化的利弊有许多说法,甚至有游行抗议。在这种语境下,很多人明显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不管他们认为它的总体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然而,如果说我希望读者从阅读本书中得到一点收获的话,那就是,“全球化”并不是新出现的,很久以来它一直在展开着。本章的关键性概念还包括“多中心”(该概念用于描述多中心的世界体系),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论它们应用于单一的还是多中心的世界体系。

关于 15 世纪的世界,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它的大多数居民——不论他们在哪里生活,不论他们的文明程度怎样,也不论他们的民俗如何——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是基本相同的。原因在于人必须吃饭,而在 5000—8000 年前的农业革命后,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方式是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主要作物是小麦、黑麦还是水稻,所有农民在面对自然和统治集团时所遭遇的挑战却是类似的,反之亦然。鉴于此,本章的大部分内容将涉及对于理解

现代早期的世界(即从 1400 到 1800 年的世界)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接下来各章将叙述 1400 年以后所发生的故事;本章我们构建一种物质生活的背景,以此为参照,可以看清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 旧生态体制

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人口的数量会有升有降,目前地球的人口数量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标表明,人类在创造物质条件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当然,人口增长的动力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会有巨大的差异,本章将对其中一些予以讨论。但首先我们还是简单估算一下全球的人口总数。

### 数字的分量

23 这里我们看一下数字的分量<sup>①</sup>,以便构建一幅总体的图景。今天,地球上也许已有超过 60 亿的人口。而在 600 年前的 1400 年,人口数量只是这一数字的 6%,即大约 3.5 亿人,略多于今天美国的 2.8 亿人。到 1800 年,人口增长了一倍还多,达到 7.2—7.5 亿人。<sup>②</sup>不仅如此,在从 1400 年到 1800 年的 400 年中,有 80% 的人是农民,他们以土地为生,是自己和其他人所需食物的生产者。世界绝对是农业性质的,用于生产食物的可利用土地是约束任一特定时刻人口数量的恒定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的升降形成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巨大起伏,尽管在这样长时段的发展趋势中上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下降却是陡然的、急速的。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人口的增长和

下降形成了三次大的起伏。以公元 900—1000 年为开端(中国和欧洲也许是同时的),人口增长一直延续到 1300 年左右,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在 1350 年左右一落千丈。另外一个增长时期开始于 1400 年左右,直到 17 世纪中期开始下降。第三次增长开始于 1700 年左右,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虽然人口专家预测这一趋势只会延续到 2100 年左右。

### 气候变化

现在看起来,气候变化是影响前现代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的一般原因。在过去的 20 年中由于关注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历史学家和气象学家重新研究了过去的气候,的确发现了在气温和降雨方面的巨大变化。<sup>③</sup>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主要的联系表现在对于食物生产的影响,在一个 80%—90% 的人口以土地为生的世界更是如此。气温、光照和降雨的变化影响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包括小麦、水稻和树木。好的气候条件会带来丰收,而歉收将酿成灾难。长期的寒冷会严重减少食物的供应,降低社会养活现有人口的能力,从而导致人口下降。相反,普遍的温暖环境可能意味着大丰收,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sup>④</sup>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自 1700 年以来,气候变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减弱了,在这个时期,新大陆的财富和工业化减轻了以前那种对人口增长的束缚。

### 人口密度与文明

24 1400 年的 3.5 亿人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地球的表面,而是聚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人口密度的小区域内。实际上,在地球 6

千万平方英里的陆地上,大多数人只生活在其中的 425 万平方英里上,仅占陆地面积的 7%。原因自然是这些陆地最适合发展农业,而其他地区则被沼泽、草原、沙漠或坚冰所覆盖。

不仅如此,地球上这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只相当于十五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从东往西)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印度、西亚伊斯兰世界、欧洲(包括地中海地区和西欧)、阿兹特克和印加。令人震惊的是,1400 年的 3.5 亿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只占地球表面非常小比例的狭小文明地区内。更令人震惊的是,今天的现实仍是如此:世界的 60 亿人中 有 70% 仍生活在那同样的 425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sup>⑤</sup>

过去,人口最密集的聚集地在亚欧大陆(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中国在东,欧洲在西,印度在南,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与欧洲的人口几乎是持平的。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是巨大的,仅仅中国就占世界人口的 25%—40%(在 18 世纪曾经达到 40%),欧洲占 25%,印度占 20% 左右。换句话说,在 1400 年,仅这三个地区就占有世界上约 70% 的人口,而到 1800 年则增长到 80% 左右。这些诱人的数字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印度和欧洲的事情在本书中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

十五个人口密集、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那些住在乡下提供食物的人们与住在城市享用这种食物生产所带来的剩余物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城市的统治集团为保证在乡下生产的食物顺利运到城市所采取的措施也许是千差万别的。城市与乡村间的这种榨取关系已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或者公元前 8000—5000 年的农业革命时期。

### 农业革命

大约 10000 年前,在世界上那个被形象地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人们最早学会了自己种植粮食作物,自己驯养动物,因而增加了可获得食物的数量。从狩猎—采集社  
25 会向定居的农业社会的这种转变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至少独立地发生在世界上的三个地区:大约 10000 年前发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肥沃的新月地带,大约 9500 年前发生于中国北部,大约 5500 年前发生在今天中美洲的墨西哥,大约 4500 年前发生在今天美国的东部地区。它也许还独立地发生在非洲和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虽然不是发生在那里的任何地方:直到进入 20 世纪后很久,适宜动物放牧的草地上还保留着传统的特色。<sup>⑥</sup>

虽然有人反对使用“革命”这一术语,因为农业的发展持续的时间太长,即使在它的发源地也是如此,<sup>⑦</sup>但对于人们生生死死的社会生活来说,它毕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农业的发展使直接生产者所生产的食物数量不断增加,以至于他们当年都无法消费完,换句话说使“农业剩余物”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不必为生产自己的食物而奔忙的社会集团的产生,如僧侣、统治者、军人和外来入侵者,后者一般是游牧民族。这种农业剩余物的存在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拿走它,必要时可以采取暴力手段,但更通行的是税收手段。不论通过哪种方式,农民与不从事生产的统治集团间的社会分工出现了:农民的工作就是生产食物和剩余物,僧侣的职责是解释世界究竟是如何来的、为什么会存在,而统治者的职责是保证剩余物不被外来入侵者侵犯。

农业革命还导致了“文明”的另外两个标志性特征的产生,即城市和文字。由于僧侣和统治者不必自己生产食物,他们可以往

在自己的所谓的大宅院里,与村民分开。统治者还把手艺人集中在他们周围,为他们缝制必需的衣物,制造武器,修建房屋,导致更大的人口聚集地的出现,即所谓的“城市”。在这里,统治集团算计着属于自己的农民人数以及他们所生产的食物总量,特别是他们所欠赋税的数量,以此来管理自己的土地,从而发展起了计算和书写体系。除了计算人口和赋税外,书写还有其他用途,比如便于僧侣记录他们的原创故事、因农业和宗教仪式所需而推算历法、预测未来。

一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农业地区通常不能自给自足,因此人们与其他城市或游牧民族或其他牧人通过贸易交换原材料(例如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铜和锡,后来还有铁矿石)或牲畜(特别是马匹)。如果所需要的商品还具有战略意义,就是说与军事实力密切相连,统治集团往往就不仰仗贸易了,而试图通过控制产地来得到原材  
26 料,如果需要就采取武力。随着岁月流逝,这种动力导致大帝国的出现,就是那些地理上巨大的政治单位,由一个统治集团管理和控制,其臣民通常通过租税的形式向统治者和地主缴纳农业剩余物。

### 1400 年的市镇和城市

虽然世界的大多人口生活在乡下,但有着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城市的确存在着,而且我们可以把市镇和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当作社会总体财富的大致标志(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当作农民为那些自己不生产食物的人创造足够剩余物的能力的标志)。1400 年世界上 25 个最大城市中的大多数在今天仍是大城市,这丝毫不令人吃惊,除了 1400 年世界上一些最大城市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1%这一事实。<sup>⑧</sup>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有9个在中国,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第二大城市是南印度的毗耶那伽,第三大城市是开罗。只是第四大城市巴黎才把我们带到欧洲,在前25个大城市中欧洲占有5席。其他大城市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君士坦丁堡,从东向西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路上的中亚枢纽城市撒马尔罕,同样是重要贸易城市的巴格达,还有在非洲贸易路线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摩洛哥的非斯。

当然,1400年这些最大的城市(其人口充其量从80000人到近500000人)只占世界人口的1%或者稍多,而另有9%左右的人(3000万人)生活在规模从5000人到75000人的市镇和城市。不足为怪的是,它们大多也在亚洲,其中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德国最大的城市科隆只有20000人。依据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来衡量,1400年世界的财富集中在亚洲。

在村民看来,这些市镇和城市是颇有些诱人的地方,在那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吃着农民梦想中的食品,穿着使农民的粗布衣衫相形见绌的艳丽服装,而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人们是看不到的。当然,是农民所交的赋税、什一税和地租支撑起了这些市镇和城市,农民也知道这一点。同样还有另外一群人,即游牧民族,他们谨慎但也有些妒忌地注视着文明地区的城市和多产的农业地带,他们拥有军事实力,如果需要就去进攻。

#### 游牧民族

27 以农业为依托的文明地区占据了亚欧大陆上最适合农业的地带。除沙漠和沼泽外,被称为草原的大片牧场从东向西绵延在亚欧大陆上,由于常常干旱少雨或洪涝成灾,这些地区不适宜农业,

但并非没有人居住。特别是在草原上,成群的人们通过狩猎、采集和放牧来维持生计。<sup>⑨</sup>对这些游牧民族来说,在马背上流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哪里草木青青,他们就把成群的马、绵羊、牛和山羊带到哪里。他们的生活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因为他们需要城市生产的一些东西,如盐、盆盆罐罐、纺织品和其他手工制品,用马、肉、蜜或其他他们能够采集到而城市也欣赏的东西来交换。这样,亚欧大陆上的文明地区和游牧地区就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赖。

这两个团体的关系在大多情况下是和平的,但游牧民族可以形成可怕的战斗力量。作为猎人,他们是熟练的骑手和弓箭手。当气候变化导致草场干枯从而威胁他们的食物来源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劫文明地区——不论是城市还是帝国——所储藏的食物。当然,文明地区的统治集团有军队——也有义务——保护食物储备免遭游牧民族的抢劫。对那些生活在文明中心的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是未开化的:他们没有城市,他们蛮横无理,目不识丁,也许还信神信鬼。总之他们是“野蛮人”。当文明地区由于各种原因衰落时,其厄运就不仅是游牧民族的抢劫了,往往还会遭到入侵、毁灭或征服,所有这些都曾发生过。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帝国和中国汉帝国的崩溃(公元300—600年,本书不予论述),还有我们很快会看到的蒙古人在13世纪对中国和欧洲人的入侵。自然,当“文明”中心衰落时,统治者有时把游牧人的士兵编进他们的成边部队,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文明地区,为已被部分地同化的游牧人自内部征服文明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

向文明地区发起挑战的并非只有游牧民族。在森林、沼泽地、灌木丛和山脉中,还存在着其他人群。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通常



能够自给自足,能够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们还是与文明的力量有所接触,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导致农民或帝国寻找新土地以安置增多的人口时。例如,中国人就有着长期与这类人群打交道的历史,实际上也慢慢把他们分成

28 两类,其一是“开化的人”,即那些愿意接受中华文明的部分要素的人,其二是“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一概予以拒绝的人。<sup>⑩</sup>

### 野生动物

尽管世界上的大多人口仅仅集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之岛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广大的地区生活着社会组织迥异的人们。差距虽然巨大,但毕竟都属于人类。实际上,到1400年,人类迁徙经过了或几乎到达了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生活在人口密集的文明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的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人口稀少,互相之间距离遥远,这就给各种野生动物留下了许多空间。这里举三个例子就足够了。

狼群曾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嚎叫,《格林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更为可怕的是,当人口数量下降和严冬造成人类和狼都缺少食物时,成群的狼就能够——并且愿意——进入城市,1420年和1438年,狼群就曾经进入过巴黎,甚至到18世纪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据当时的一部文献记载,1779年,法国人发动了一场灭绝狼的战役,“就像他们600年前在英国的所作所为一样”。<sup>⑪</sup>在中国,虎曾经出没在大部分地区,当人类砍伐森林,破坏给它们提供鹿和野猪这些美味猎物的生态系统的时候,它们就周期性地袭击中国村庄和城市,掠走猪仔和婴儿。在东北地区老虎如此之多,以至于皇帝的打猎队伍一天能够猎获60只虎,外加1000只牡赤鹿,

有报告说,直到1800年老虎还在袭击中国南部的村庄。<sup>⑫</sup>尽管如此,最大的自然宝库还是在新大陆,特别是北美洲,第一批到达的欧洲人描述说,那里鱼、鸟、鹿、熊和树木的数量与规模是“不可思议的”。<sup>⑬</sup>

从1400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从3.5亿增加到7.2亿,但与此同时仍给各类野生动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然而,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人口增多,野生动物就会减少,特别是由于“文明地区”的人们想穿动物的毛皮(在中国、欧洲和北美)或想吃异域的鱼虾和飞鸟。大规模的打猎探险队那时开始了行动,所猎取的对象有鲸、虎、野牛、狸、归途中的鸽子、鲨鱼、狐狸,其种类与日俱增,为的是获取兽皮、肉以及它们身体的各部位。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已经灭绝的或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得到保护的动物除外。

因此,地球上人口的扩张意味着其他物种可利用的土地和自然环境的减少。虽然我们的生存依赖于环境,但我们人类却一直

29 习惯于以牺牲其他物种为代价来谋取自己的生存空间。<sup>⑭</sup>有时,其他物种的灭绝就像一次步枪射击,物种被清除了,剩下的物质环境并没有改变,就像狼群在英国、法国或威斯康星遭灭绝、野牛在北美大平原遭灭绝一样,虽然动物贫乏了,但森林或平原依旧。但在其他时候,一个物种的灭绝就像一次大毁灭,在那里,膨胀中的人类砍伐并烧毁整个生态系统,把它们变成农田,华南虎就曾遭此厄运。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在14世纪中期和17世纪中期人口曾大规模减少,在每一次机会中,野生动物都重新恢复生机并开始扩张。但在18世纪中期之后,世界上的人口一直在稳定增加,给所有现存的野生动物造成了压力。

### 人口增长与土地

人口增长和下降均会给社会带来某些好处,也会造成某些困难。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标志着我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更多能源的努力是成功的,这一点对所有生物有机体都适用。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人口密度使文明、城市、教育和贸易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人更加警觉和理解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口增长可以伴随着环境的改善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其中有一个度,其最高局限就是可利用土地的数量和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能力。如果超过这一局限,人口的需求就会超过养活他们的土地的能力,导致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死于疾病和饥荒的可能性也会增加。随着人口的减少,需要吃饭的人口数量与给他们提供食物的可利用土地的总量之间更为合理的平衡关系建立起来。

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供应,而在1400年可利用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这种供应的增加只能来自三个渠道:增加可耕地,在现有土地上增加劳动力投入(包括选取良种),增加水和肥的使用。例如,从14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从8500万增加到3.2—3.5亿人,是原来的四倍,这种增多的人口的供养部分地来自可耕地的增加,也同样重要地来自在现有耕地上进行更高水平的精耕细作和肥料利用。<sup>⑤</sup>

当然,开垦新的土地意味着人口向新土地的迁徙,并且需要与30 野生动物搏斗以取而代之,同时还要与大山、森林和灌木丛中“未开化的”人进行战斗。有些迁徙是相对容易的,特别是如果新土地人烟稀少、防御状况糟糕,或者迁徙中的人们有作为其后盾的帝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中国就是这样)。然而,有些地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到局限,例如欧洲人就不能过多地把眼光投向东方,因为那

些土地已被多支强悍的游牧民族占领,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蒙古人都令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毛骨悚然。

总之,生活在1400年的3.5亿人几乎都是农村人口,他们生产食物,也生产手工业需要的原材料,养活自己也养活为数不多的统治集团,后者以赋税(交给国家)和地租(交给地主)的形式从收获物中提取一部分。农民家庭时常从事纺织,不仅自己使用,而且在地方集市上用以交换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有时,他们的纺织品还进入一些长途的贸易网络,很快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一点。如果风调雨顺能够带来连年的好收成,农民家庭也许打算扩大家庭规模,<sup>⑥</sup>特别是如果近处有另外可以利用的土地,或者政府鼓励远距离移民并保护他们免受狼、虎和游牧入侵者攻击的威胁。如果人口增加太多或太快,超过土地供养他们的能力,几次歉收就会造成饥荒,并且会增加传染病的发病率,这种情况在14世纪初、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都曾经发生过。

传染病、饥荒、战争和其他灾难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比今天要短许多。在前现代世界的许多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到欧洲的英国和德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般为30—40岁,<sup>⑦</sup>或者说只相当于今天发达世界中大多数人寿命的一半。当然,那时的平均寿命短暂主要是由于婴幼儿死亡率高:女人生下很多孩子,但有一半能活到15岁就不错了。一旦逃过儿童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在良好的农业环境下,很多人就有望活到60多岁。

### 饥荒

食物短缺、歉收和饥荒是1400年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把这些灾难仅仅归咎于“自然原因”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在那时，世界上 80%—90% 的人口是广大的农民，这些农村人口为社会生产食物和工业原料，每年必须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的代理人，当然也有少数人非常幸运，能够自由而明确地占有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和服劳役就可以了。<sup>31</sup> 在亚欧大陆高人口密度的大部分地区（即中国、欧洲和印度），农民家庭要将多达一半的收获物上交国家和地主。<sup>32</sup>

在好的年景或改善的环境下，农民家庭也许能够收支平衡，能够提供自己生活所需，也能够应付收税人和征租人，还可以有些剩余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歉收的时候怎么办呢？“善良的”政府和“善良的”地主也许会认识到再像常年那样征收会把农民家庭逼到贫困生存线以下，因而减少或取消当年的租税。但如果政府或地主不能够或不愿意——例如他们要向别人还债——这样做，敲骨吸髓的事情就会发生。实际上，18 世纪的日本地主谈到农民时就曾说，他们就像芝麻，压力越大，榨取的油也越多。

因此，在农业社会中，饥荒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现象，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现象。<sup>33</sup>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念：他们在社会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能够想方设法谋求这些权利。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农业社会并不是由统治集团创造的，而是国家代理人、地主和农业生产者之间互相作用、互相理解、互相妥协（有明确的也有不明确的）的结果。<sup>34</sup>

### 农民起义

农民是默默忍受可能的饥荒还是揭竿而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两个因素。第一，面对国家或地主的残酷压迫甚至生命威胁，不论农民如何愤怒，但如果政府或地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并随时准备使用这支力量，而农民也了解这种情况，那么农民也许就会认为他们只能忍受，如果可能就一逃了之。第二个因素与农民团体的黏合力有关。即使没有外力阻止他们采取行动，如果农民团体没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们也许就只能静静地忍受痛苦，甚至死于漫漫长冬。<sup>35</sup>

在太多的时候和太多的地方，农民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都受到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他们反抗现行的社会秩序，成为旧体制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在日本，从 1590 到 1871 年，有三千多例农民起义，从烧毁粮仓到拿起武器各种形式都有。中国的农民起义要少一些，但规模要大得多，尤其集中地发生在 17 世纪中期以及 19 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中。俄罗斯也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 18 世纪的普加乔夫大起义，而法国在某些方面是农民起义的传统舞台，特别表现在伴随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中。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农民起义的历史。看起来，处于统治集团控制下的农民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总有办法反抗或反叛，即使这些行为极少给社会的运行带来重要变化。

### 流行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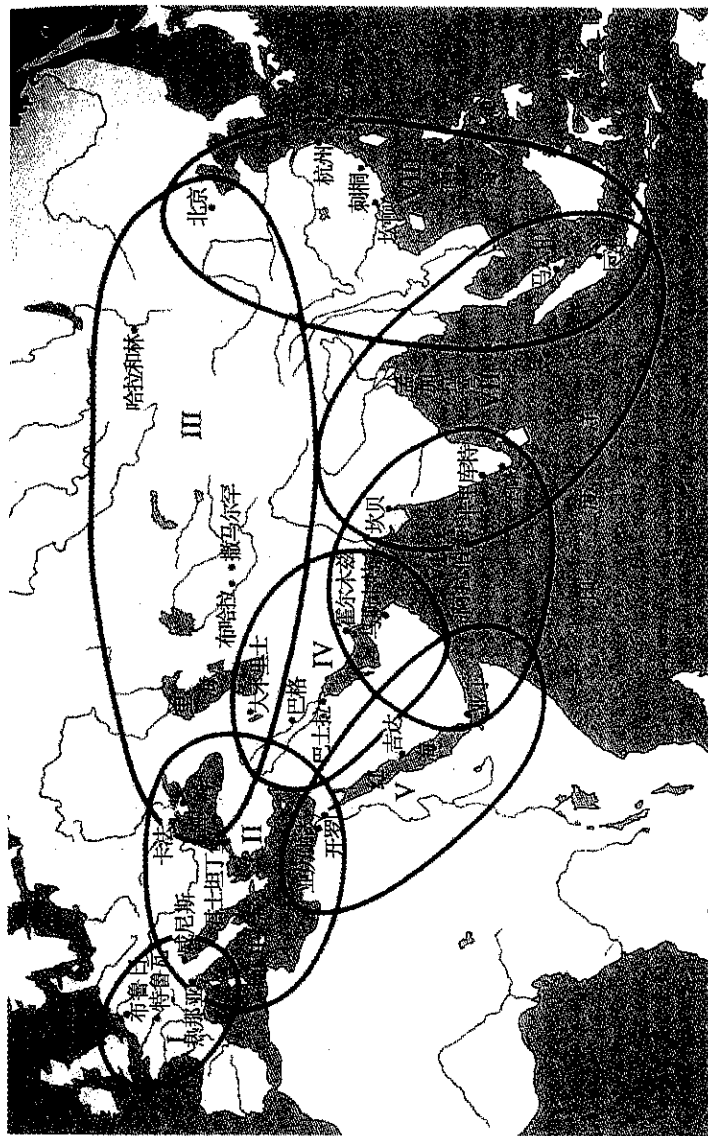
世界人口的 80%—90% 是农民，不论在中国、印度还是在欧洲各地，甚至在中美洲也是如此，他们支撑着统治集团，后者的职责就是管理、打仗、主持宗教仪式和从事贸易。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农民的存在使各种类型的人类“大寄生虫”靠他们生活成为

可能。另外，整个人类还要遭受小寄生虫携带的流行病的危害(例如,黑死病的鼠疫病菌,天花和流感病毒,导致登革热或痢疾的病菌,还有所有其他致病的病菌和病原菌,由于它们今天已变异或消失我们无法给它们命名)③。

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农民或市镇和乡村的穷人来说,市镇和乡下的富人有更多办法避免死于流行病,但是流行病能够而且的确影响着整个人类。流行病还可以在全世界传播,但最初传播较为缓慢,原因在于那时文明中心间的贸易和接触比较缓慢。罗马帝国和中国汉帝国刚刚崩溃后的一段时期就是这样,那时天花和麻疹从它们在欧洲和中国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在13世纪,长途贸易使世界的整体联系增强了,一种流行病就可以而且的确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从亚欧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黑死病在几年内就从中国传到欧洲,而一旦到达欧洲,它就在1347年底到1350年的三年内肆虐了几乎所有地区。要理解黑死病如何并且为什么如此快速地从中国传到欧洲并在欧洲流传,我们需要理解那时把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网络,它使得商品、思想和病菌从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成为可能。

### 世界④及其贸易体系

33 在14世纪,旧大陆——包括亚欧大陆和非洲——被处于三个大的子系统的八个内部互相联系的贸易圈连接了起来。④东亚子系统连接起中国、热带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和印度;中东—蒙古子系统连接起从东地中海到中亚和印度的亚欧大陆;欧洲子系统以法国的香槟市集和意大利城市国家热那亚与威尼斯间的商路为



地图 1.1 13 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八个贸易圈  
资料来源: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

中心,把欧洲与中东和印度洋连接起来。不仅如此,这些系统是互相重叠的,北非和西非联系起欧洲和中东子系统,东非又进一步联系起印度洋子系统。(见地图 1.1)

三条重要商路把这些子系统连接起来,使我们能够谈论整体的贸易体系。这三条商路的终点都在东地中海。北线向北经过黑海,然后在陆地上穿越蒙古帝国,在蒙古人的允准和保护下,一路进入中国。例如,正是通过这条商路,马可·波罗在 13 世纪后期冒险到达中国。中间的商路经过巴格达(1258 年后被蒙古人控制),然后经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样就给商人们提供了直接获取南亚和东南亚香料和手工制品的机会。南线经过马穆鲁克帝国控制的开罗,从陆路向南到达红海,再从那里进入印度洋。

13 世纪把非洲—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体系由于一系列原因而引人注目。首先,对于那些仅仅关注世界的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地区——例如中国、印度或法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居然能够存在就令他们吃惊不已。直到最近,历史学家还以流行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发展为研究单位来施展他们的技艺,而不是采用更为全球化的态度。即使那些率先以全球化的态度审视 1500 年后的历史时期并发明“世界体系”这一术语的历史学家们,也主张世界体系只是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之后才慢慢形成;在此之前,各帝国往往独占地球的部分区域,而互之间联系稀少。<sup>35</sup>他们认为,即使这些帝国之间有贸易往来,也往往是专门为了了一小撮统治集团所需的贵重商品。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已认识到这一先前存在的世界体系,但这又引发了关于该体系与 1500 年后所形成的体系之间的联系的一系列问题:1500 年以后的体系是全新的还是源于先前体系的某些因素?我倾向于后一种解

释,在下一章将予以论述。<sup>36</sup>

13 世纪世界体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运行没有一个集权控制或主导力量。对那些设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下发展起来的人来说,一个体系没有控制中心而能保持运行有些不可思议。<sup>37</sup>当然,每个贸易圈都有一支居支配地位的力量,如欧洲体系中的意大利人,中东贸易圈中的阿拉伯人,东亚贸易圈中的中国人,但任何一支力量都不能控制整个体系。虽然各地的统治者都给商人、车队或船只提供保护,但不需要使用军队来保证商品在体系中的流通。的确,大多数统治者认识到贸易的价值——特别是当他们认识到可以从中收税的时候——因而鼓励和保护它,他们不想用暴力强取来自世界另一个地区的商人的货物,就像不愿杀死下金蛋的鹅一样。

因此,14 世纪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它包括几个地区性体系,其中每个体系都有人口密集而富裕的“核心”,周围是给核心地区提供农业和工业原料的边缘地带,大多数体系之间通过贸易网络松散地联系着。不仅如此,我认为直到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后期,即 1800 年左右,世界仍是多中心的,那时,欧洲人把在地球大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所必需的一些要素置入各地,如火如荼地创造着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地区和一个不发达的边缘地带的全球体系。即使到那时,一些区域——特别是东亚的部分地区——仍然强有力地抵抗着完全殖民化。我们设想世界曾经是多中心的而不是由单独一个中心主导的,其重要性随着我们的叙述将逐步明朗。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世界是多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有助于我们协调世界众多地区的声音和行动,而不仅仅是欧洲的。一句话,这是关于世界历史的非欧洲中心论叙述的至关重要的部分。

最后,大约 1300 年的非洲—亚欧大陆体系被称为“世界体系”不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整个地球,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sup>36</sup>实际上,它的确是一个世界体系,因为它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这样的地区,在那里,人们进行着贸易,因而互相之间有所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是多么得少。很明显,尚没有与非洲—亚欧大陆贸易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是美洲人和在那里独立建立起来的几个帝国,或者还有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

36 我用于描述世界——集中在各区域体系之间的联系——的方法强调贸易和商人在缔造这些联系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商人和贸易在创造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在下一章将详细论述的,贸易使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出售他们生产或采集到的最佳物品,不仅如此,商人还充当了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中介人,在他们的骆驼和船只运载货物的同时,他们的大脑中也装载着思想、书本知识和行事方式。此外,流行病和死亡、士兵和战争也沿着商路前行,研究 14 世纪中期黑死病中世界的遭遇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此之后,大多亚欧大陆的人们共同陷入了疾病的深渊。

### 黑死病：14 世纪中期的历史偶合

14 世纪中后期是世界历史上严重的危机时期。<sup>37</sup>蒙古帝国曾经是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黏合剂,但 1350 年左右该帝国崩溃,这是危机的表现之一。黑死病的严重危害也是危机的表现。这是一种恶性传染病,更为流行的名称是腺鼠疫,在 14 世纪中期带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就像它的后果非常复杂一样,黑死病爆发的

原因及具体情况也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在导论中论述过的“历史的偶合”这一概念作为工具来慢慢理解它。

腺鼠疫是一种杆菌造成的。这是一种高致病性细菌(巴斯德菌),在中国西南部的穴鼠中流传。如果不传给人类,这种病菌本可以局限于鼠群;但如果通过跳蚤叮咬传给人类,通常在几天内就会造成人群的大量死亡。靠近染病鼠群的人们保留着一些禁忌,可以使他们安全地远离携带跳蚤和细菌的老鼠。但那些到达疫区的无知的陌生人或新来者就不是这样了,而在 14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西南部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那里作战的蒙古军队明显把跳蚤或一只染病的老鼠带到中国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在 1331 年引发了一场传染病,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在一些地方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疾病。

如果其他几个本不相干的事情没有发生,鼠疫本来可以只是中国的一场灾难。第一,在欧洲,鼠群不得不在人群中成长和生活:由于各种原因,大黑鼠(*Mus rattus*)在人们房屋的阁楼和橡木上安居下来。第二,欧洲人口从公元 1000 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增 37 长,到 1300 年土地和提供燃料的森林明显短缺。雪上加霜的是气候变糟,冬天日益漫长而寒冷,生长季节则日益缩短,人类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在欧洲爆发某种疾病的时机成熟了:如果不是鼠疫,也许是另外一种什么疾病,可能不会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或同一个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引火柴已备好,所需的只是把它点着的一个火星。所流传的疾病不是别的正是鼠疫,而且非常迅速地流传,这其中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首先,蒙古帝国几乎横跨整个亚欧大陆,其交通系统主要利用北部穿越广袤的、不长树木的大草原的商路,这便于他们的马匹快

速地传递信息。不仅如此,这种草原生态系统中躲藏着某种穴鼠,它们生活在广阔的地下“城市”,易于受鼠疫细菌感染。1331年鼠疫在中国爆发后不久蒙古骑兵就挥师西进,毋庸置疑地把鼠疫传给了大草原上的老鼠,进而在亚欧大陆流传开来。

第二,欧洲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穿针引线连接起来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然而,如果没有第三种情况的发生,鼠疫也许不会传到欧洲。黑海岸边的贸易城市卡法(Caffa)是跨越亚欧大陆的商路的纽带:它是来自中国的贸易车队的西部终点,也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船队贸易的东部起点,而1346年12月两只商队都明显停靠在卡法的码头附近。与此同时,一位蒙古汗的军队正在围攻卡法,如果不是因为蒙古军队中爆发鼠疫导致大多数士兵死于疾病,从而迫使汗撤军,该城市也许就攻下了。如果跳蚤、老鼠和染病的意大利人没有登上船只起航回国,鼠疫也许就止步于那里了。意大利人在1346年回到家后,鼠疫在欧洲肆虐开来,很快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商路——特别是水路——传到其他城市。不仅生活在欧洲房屋中的大黑鼠把鼠疫传给人,染病的人通过咳嗽也直接传给别人。鼠疫在欧洲迅速蔓延,到1350年已经径直到瑞典,后来在那年冬天也降临莫斯科。

像饥荒一样,鼠疫也不纯粹是一个“自然”现象,相反,它需要一系列原因综合起作用才使它在世界及其历史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在几年中,欧洲人口从8000万陡然下降到6000万,在中国,鼠疫连同14世纪50、60年代的战争造成人口暴跌,从1200年的1.2亿人跌至1393年的0.85亿人。鼠疫也许还给伊斯兰世界、印度和大草原上游牧的蒙古人造成了很大破坏,虽然现存的史

料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sup>⑥</sup>

人口的大量死亡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死尸高高地堆在乡间小路上,被一辆辆车拉去掩埋,或者在划入大海的木筏上焚烧。尽管有这些不寒而栗的回忆,但五十年后生活在1400年的人们确有了更多更好的土地、更多的燃料和更多的其他各种资源,尽管世界贸易体系的各区域间的贸易速度大大减缓了。这样,14世纪黑死病的故事不仅表明了流行病对人类和世界历史的影响,同时也显现了世界各地间的早期联系,在该个案中是欧洲与东亚的联系。在商路上运行的不仅有商品、人和思想,还有可怕的疾病。

### 结论:旧生态体制

人类在与大小寄生虫——靠农民生存的统治集团、战胜或溃败给游牧入侵者的文明人、悄悄繁殖然后杀死游牧人和城市居民的病菌——的对抗中或者取胜或者丧命,这种势均力敌的状况被称为“旧生态体制”(“biological ancient regime”,或者 biological “old regime”)。<sup>⑦</sup>在这个世界——不仅包括1400年的世界,还包括几千年前直到进入19世纪很久以后的世界(我们在第五章将予以讨论)——上,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必须特别在意环境给人类活动所提供的机会或施加的限制。其结果是,人口增加不至于太多太快到威胁社会的环境基础的地步,当然有几个例外的情况。<sup>⑧</sup>后来的发展打破了旧生态体制,从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内容本书后面将会涉及。

农业不仅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还为那时所有的工业——特

别是制作衣物的纺织业——提供大多的原材料。在中国，纺织业最主要的原料是蚕丝和棉花，印度是棉花和蚕丝，而西北欧则是羊毛，所有这些原料都来自农田。取暖和加工这些原料的燃料也来自森林。从这种程度上说，旧生态体制是有机的，即，它依靠太阳能生长供应食物的庄稼和供应燃料的树木。这样，旧生态体制限制了人们活动的可能性范围，也限制了他们的历史，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凭借太阳每年赐予的再生性能源。

39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能量来生存，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食物和能源的同步增长。实际上，农业赋予人类的是控制自然过程，并把其中的能量输送给人类。在旧生态体制中，农业是人类改变环境的主要手段，即把一种生态体系（例如森林或草地）变成另外一种（例如黑麦或小麦田、稻田、鱼塘或鳊鱼堰），以便更有效地为人类输送食物能源。人口的规模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可利用土地的数量，其二是人类利用土地所提供的能量从事其他活动的的能力。

不管到1300年左右旧大陆的人口数量是否触动了环境极限——有些历史学家持这种观点，随后发生的黑死病使世界人口急剧下降了，特别是在中国和欧洲。此后，从1400年左右开始，世界人口数量又开始上升，并且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350年后再次触及旧生态体制在某些方面的极限。可以肯定的是，到1750年，世界人口已达到7.5亿左右，是1300年中世纪人口顶峰时期3.6亿人的两倍多。

为了供养两倍于过去的人口，人类与可利用土地的关系和他们利用土地的效率应当有所改变。一方面，欧洲人将面对整个新大陆，面对美洲人，必须向那里移民。虽然这个新大陆在1400年

已有相当多的人口，其土地也被土著美洲人利用起来，然而广泛的物种交流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关系，到1600年美洲反倒成了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这些情况我们将在第三章涉及。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使得一个区域贸易网的人们能够集中生产最适宜在他们的环境中生产的商品，并通过市场与无数其他正从事同样事情的人互通有无，即出现了地区性分工，从而提高了总体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市场的分工传播开来，使世界生产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物品，但仍然没有逃脱旧生态体制的局限。这种全球贸易网是怎样重新建立起来的将是下一章的部分内容。

#### 注 释

- ① 该术语引自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Sian Reynolds 的英译本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chap. 1.
- ② 由于没有人真正进行过调查，这些数字是历史人口统计学家重构的，而对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的人口数量、分布和增长动力诸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前引布罗代尔书第一章观点的权威性与任何探讨前现代人口数量的不确定性的人的观点几乎是一样的。参见 Colin McEvedy, Richard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 ③ 气象学家已经认定了几个“强有力”的因素，包括天体的运行轨道、火山粉尘和太阳活动周期。关于气候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见 H.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ethuen, 1982)。关于火山活动对气候和人类社会的详细考察，见 William Atwell, “Volcanism and Short-term Climatic Change in East Asian and World History, c. 1200-1699,”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 no. 1 (Spring 2001): 29-98。
- ④ 直到最近，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收成的影响的研究还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那样的边缘地区。我自己对中国南部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甚至能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亚热带地区的收成。然而,强调气候环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并非意味着地理环境决定论:即,人类社会取决于人们赖以生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特性。相反,人类具有出乎意料的适应能力,并且创造了社会组织来弥补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无常所造成的损失。例如,18世纪的中国就建立了政府粮仓,用于在急需时发放救济粮,同时中国也存在着市场,能够把粮食从剩余的地区运到短缺的地区,这两者都使中国人口的增减摆脱了纯粹由气候变化所决定的局面。但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始自18世纪后期。见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s. 6-8。

- ⑤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56-57. 在布罗代尔所列举的文明中没有包括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因为它们没有铁器、车轮、耕犁或大耕畜。我之所以把它们包括进去原因在于,它们虽然缺少这些要素,但的确创造了拥有城市、社会阶级的帝国,在阿兹特克还有文字,我认为这些都是文明的标志。关于为什么旧大陆有家庭饲养的大耕畜而新大陆没有,参见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Cambridge: W. W. Norton, 1998)。
- ⑥ 关于这些地区为什么会兴起粮食生产及其产生时间的有趣的探讨,见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esp. chaps. 4-10。
- ⑦ Clive Ponting 的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chap. 4 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Ponting 更愿意使用“transition”一词。
- ⑧ 对1400年城市规模的估计并不比对于人口总数的估算更为科学。然而, Tertius Chandler 在他的概要中繁琐地列举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见 *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An Historical Census*, 2d ed.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87)。虽然有人会对他的数字持不同看法,但我们这里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城市的相对排名及其地理分布。
- ⑨ 追随 G. W. Hewes, Braudel 列举了 27 个可以辨认的采集狩猎部族, 17 个游牧部族, 另外还有 18 个原始农业部族。参见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56-60。
- ⑩ 关于中国向边疆扩张过程中的“开化的人”和“未开化的人”, John Shepherd 有非常有趣的论述, 见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⑪ 引自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66-67。
- ⑫ 见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10。
- ⑬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 ⑭ 这一德国术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纳粹分子使用,表达他们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进行扩张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受到德国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德国领土供养能力的舆论的煽动。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人们对以牺牲自然世界为代价来扩张地盘的普遍感受是贴切的。
- ⑮ 关于1400到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存在着许多学术争论,其基调是 Ping-ti Ho 在1953年的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定下的, Dwight Perkins 的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cago: Aldine, 1968) 追随这种观点。人们一般认为在1850年中国的人口是4.2—4.5亿,而 G. William Skinner 认为该数字应缩小至大约3.8亿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8, no. 1 (1987): 1-80), 但 E. W. Mote 认为中国在1600—1650年及以后的人口要远远高出原先所估计的数量, 见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43-747, 903-907。
- ⑯ 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农民家庭为什么决定控制家庭规模, 又是如何决定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第五章探讨工业革命时将予以更详细的论述。
- ⑰ 见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40。
- ⑱ 在欧洲许多地方, 教会也向农民征收“什一税”, 农民要上交收成的十分之一, 修道院也可以变成大地主。
- ⑲ 这种情况恰与文明的起源相伴随, 并且延续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在这

方面有一本简明而可读性强的历史著作,见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esp. chap. 6.

- ② 关于这种观点的发展的详细情况,见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参见 David Arnol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 ③ 关于农民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的的能力,见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北美的黑人奴隶, Eugene Genovese 进行了类似的有趣探讨,见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 ④ 关于农业社会的农民和农民起义,有一系列令人称道的著作,见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ric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以及 Barrington Moore,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66)。
- ⑤ 大小寄生虫的思想是在 William McNeill 的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一书中形成的。
- ⑥ 在这里,这一惯用语不包括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 ⑦ 这种描绘依据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美国历史协会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印成了一本小册子,见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Dead-End or Precursor?*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3?)。
- ⑧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89)。
- ⑨ Abu-Lughod 和 Wallerstein 认为 1500 年后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创造的全新的体系,与此前的体系没有联系。
- ⑩ 然而,互联网这一例证应当使我们更加感受到庞大、复杂的组织在没有任何集权控制下形成的可能性。例如,要建立一个网页,只需登记一个域

名,而不需要征得任何人的同意。

- ⑪ Immanuel Wallerstein 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 这里用了连字符), 见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5。他的“世界体系”一词所指的主要是他所认为的在 1492 年后首先兴起于欧洲随后由欧洲人传播到全球的那种世界体系。其他人使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 没有连字符)一词,指的是类似但有所不同的体系,如我所描述的“多中心”的世界体系(即那种并非创造的、向周围扩散的、也不必由欧洲人控制的“世界”体系)。
- ⑫ 这一部分主要依据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chap. iv。
- ⑬ Michael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⑭ 这一术语以下两人都使用了,见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70-72, 以及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chap. 12。
- ⑮ 有关例证见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chaps. 1, 5 and 17。